国难背景下知识分子命运的生动写照

——《寒夜》《巴山夜雨》人物形象比较论

谢家顺

引 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成了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全面抗战，一致对外”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无数作家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逐渐缩短了自身与群众、生活的距离，他们用自己的笔，耕耘着，收获着，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再现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在这众多的作家中，有两位作家值得单独一提，这就是以战时重庆为背景，以当时知识分子生活状态为素材，对战争进行深刻思考的巴金和张恨水。其作品分别为《寒夜》和《巴山夜雨》。巴金的《寒夜》写于1944年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完成于1946年12月31日。小说以一个小公务员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悲剧故事，揭示了旧中国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命运，暴露了抗战后期“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张恨水的《巴山夜雨》创作于1946年，并于同年4月4日至1948年12月6日连载于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1986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部小说以为人正直的知识分子李南泉为中心，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既有战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骨气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又有战时重庆市民生活众生态的入木三分的刻画。由于这两部小说的作者是抗日战争的亲身感受者，因而小说所选取的战时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平淡而且悲痛，气氛低沉却别有深邃的内涵，显示了人物对生活的无奈和抗争、信心与希望，表现了作者对战争和黑暗的有力控诉。

一、战争与人性的探索——人物生存状态的两极反差

进入近代史以来，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三座大山的压迫，经济、物质上的极度匮乏，精神世界在无数天灾人祸中遭到严重的戕害——委顿与清醒成为衡量当时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尺度。因此，描写中华民族处于觉醒期的生存状态，再现这一状态下百姓的生活现状，以唤起民众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危机感，以唤起百姓“灵魂的自制力”，这是进入近代史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以写人生为旗帜作家们的共同任务。（1）抗战使中国大地上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发生了急剧深刻的变化，在中国社会性质和状态发生改变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生活内容与要素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社会生活已然是另一种形态。体现在文学上，那就是作家们加强了文学创作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使得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注重了对战时生活中人们生存状况的再现，表现“人与现实的关系，探索人世间合理的生活，以自己的方式和体验提出人生里的一些根本的问题”。（2）

《寒夜》《巴山夜雨》以战时重庆为创作背景，分别以重庆市区的居民区和市郊的疏散新村为视角，塑造了战争氛围里下层知识分子形象及由此涉及的社会众生像，给读者展现了一幅战争环境里人们挣扎呼号的社会图画——一种因战争而带来人性扭曲的人物生存状态的两极。

这里，仅以两部小说男主人公汪文宣、李南泉为例来剖析。他们的生存状况是如何呢？他们都是读书人，因为战争，他们从下江来到了重庆——

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担任校对工作，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3）住在当时的民国路那个三层“大楼”。……这座“大楼”破破烂烂，是将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4）每天躲警报。

李南泉：以写作为生的作家，他穷困潦倒，却安贫若素。住的是“国难房子”，这屋子虽然是茅草盖顶，竹片和黄泥夹的墙壁，可是这一带茅草屋里的人士，倒不是生下来就住着茅草屋的。（5）也是每天跑防空洞，躲空袭。

前者住在重庆市中心，后者住在郊外的乡下，二者日常生活的生存环境的艰难，客观地再现了抗战时期人们的生存意识，是当时人们生存状况的缩影。正是以汪文宣、李南泉等人物生存状况而构成的一幅幅“受难图”，向我们展示了由于战争这种灾难性的生存变异才造成人们的生存危机。就此而言，以汪文宣、李南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就具有了一种典型意义。

如此动荡、令人感到没有安全感的国统区生存环境，使得小说里的人物向着生存的两极延伸：

一方面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抱负，寻求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忙碌奔波，与生活进行着抗争。汪文宣曾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大学生，把从事教育事业，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作为自己的高尚理想，贯穿于自己的生活，甚至他得了肺病、吐了血之后还念念不忘：“是啊，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所以他不愿苟且，不愿意拖累别人，即使他心爱的妻子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环境离他而去，也是抱着理解的态度。李南泉也仅是为寻求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为了全家的生计，在几十里来回的山路上奔波，他痛恨战争，无限感慨地说：“好山，好水，好月亮，好的一切天籁，人为什么不享受，而要用大炮飞机来毁灭？”另一方面是那些因战争而丧失生命，以及因战争而暗淡了的生存环境，以消极的生存方式，在自我戕害、放逐中消耗生命。这一点，两部小说表现的角度略有不同。《寒夜》借汪文宣那在压抑生存环境中充满对外在世界痛忧与无奈的生命历程刻画，展示了对生活失去信心、心绪极端痛苦的唐柏青以及老实诚恳的钟老的不幸。《巴山夜雨》虽没有《寒夜》那种“寒冷”感，以李南泉为中心，串联起来的却是一批堕落文人的桃色新闻和一群太太们的麻将消遣。

与此两极相对立的则是一些富员大亨的骄奢淫逸，贪官污吏的飞扬跋扈，投机商人的囤积居奇……对于这些，作者则以揶揄、讽刺的笔调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总之，《寒夜》《巴山夜雨》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向我们展示的战时生活，其中人物在生命形态上具有两个特点，这就是：

第一，注重了下层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刻画，表现战时重庆知识分子的生存意识，诸如生存品质、生存质量、生存目的、生存手段和生存理想等。《寒夜》对汪文宣日常生活进行了如此描写：

有一次母亲为他买了一只鸡回来，高兴地煮好鸡汤用菜碗盛着端给他吃。那是午饭后不多久的事。这两天他的胃口更不好。

“你要是喜欢吃，我可以常常煮给你吃，”母亲带点鼓舞的口气说。

“妈，这太花费了，我们哪里吃得起啊！”他却带着愁容回答，不过他还是把碗接了过来。

“我买得很便宜，不过千把块钱，吃了补补身体也好，”母亲被他浇了凉水，但是她仍旧温和地答道。

“不过我们没有多的钱啊，”他固执般地说：“我身体不好，偏偏又失了业。坐吃山空，怎么得了！”

“不要紧，你不必担心。横竖目前还有办法，先把你身体弄好再说，”母亲带笑地劝道，她笑得有点勉强。

“东西天天贵，钱天天减少，树生还没有走，我们恐怕就要动用她那笔钱了，”他皱着眉头说。鸡汤还在他的手里冒热气。

母亲立刻收起笑容，她掉开头，想找个地方停留她的眼光，但是没有找到。她又回过脸来，痛苦而且烦躁地说了一句：“你快些吃罢。”

他捧着碗喝汤，不用汤匙，不用筷子，还带了一点慌张不安的样子。……“很好，很好，”他接连称赞道，他的愁容消失了。他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汤碗。

“我不是病，我就是营养不良啊，我身体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解释般地说……

他又专心去吃碗里的鸡肉，他仿佛从来没有吃过好饮食似的。他忽然自言自语：“要是平日吃得好一点，我也不会得这种病。”他一面吃，一面说话。……

“妈，你也吃一点。味道很好，很好。人是需要营养的，”他吃完鸡肉，用油手拿着碗，带着满足的微笑对母亲说。（6）

这段描述的是汪文宣生病后，家里难得的一次营养加餐。汪文宣的母亲劝他吃鸡，而他不愿吃（因为吃不起），但又怕引起母亲伤心的内心世界及其动作刻画得惟妙惟肖。

同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巴山夜雨》则描画的是重庆城郊疏散区知识分子的群体生活状况。以食为例：杨教授挣的薪水只够全家半月的粮食，为了省几个脚力钱，自己到学校扛平价米回家；吴春圃，年已花甲，除在大学里当副教授外，还在高中里兼了几点钟的代数几何，另加假期找的“外快”，但家里吃的却是倭瓜、牛油、牛筋；即使是做小本生意的刘老板家喝的却是马尿似的茶……

所有这些，加深了人们对战争带来的生活苦难的深刻认识，激起了人们对抗战胜利的热切期盼，正如《巴山夜雨》主人公李南泉的感叹：“将来抗战胜利了，我们这些生活片段，都可以写出来去留给后人。一来让后人知道我们受日本的欺侮是太深了，二来也让后人明白，战争总不是什么好事。”

第二，注意了战时人物内心精神世界的解剖。《寒夜》里，当汪文宣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时，作者努力写出了主人公此时的内心精神世界，当蜡烛的火苗在风中摇曳时，他突然大喊：

“快拿剪刀来！快拿剪刀来！”他并不想说这样的话，话却自然地从他的口中漏出来，而且他现出着急的样子。这样的事情不断地发生，他已经由训练得到了好些习性。他做着自己并不一定想做的事，说着自己并不一定想说的话。（7）

烛花剪不剪本是极无所谓的事，此时的汪文宣却居然要这么着急地大声疾呼，当然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对汪文宣来说，他必须对自己、对别人证明自己还活着，还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因此哪怕是极为无关紧要的事，他都会当成急迫的事来对待——这就是隐藏在这种奇特的心理现象后面的奥秘，同时也是极为惊心动魄的奥秘！汪文宣的那种茫然若失、不知所措的精神世界昭然若揭。

这种对人物精神世界的解析，在《巴山夜雨》里也有突出体现。张恨水在历数日本侵略者令人发指暴行的同时，又将笔触转向了故事中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使读者认识到：战争不仅毁灭了人们的肉体，而且撕裂着人们的精神。为此，小说描写了三对性变态男女的“桃色新闻”——奚敬平、秦致馨与奚太太，石正山、义女小青与石太太，袁四维、勤务员之妻张小姐与袁太太之间的新旧之争。这些故事，深刻而犀利地暴露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以及所引起的心理变态。诚如小说所述：“要说生活艰苦，这些新闻不宜产生。若说不艰苦，很少人家不吃平价米的。”其中原委，当时人一语破的：“在这抗战时期中，男女都有些心理变态。若是无伤大雅，闹点桃色事件，作太太的人尽可不过问。”对此，作者借李南泉之口发出了如此议论：“在空袭的时候，个个都发生心理变态，除了恐怖，就是牢骚，这牢骚向谁发泄呢？向敌人发泄，不能够。向政府发泄，无此理。向社会发泄，谁又不在躲警报？向自己家里任何一人发泄，也不可能。只有夫妻两口子，你也牢骚，我也牢骚，脸色先有三分不正常。反而谁得罪了谁也没关系。”（8）战争就是这样戕害着小说中人物的心理，腐蚀着人物的灵魂。

如果说《寒夜》《巴山夜雨》分别以汪文宣、李南泉为中心共同的勾连起了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城乡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画卷的话，那么《寒夜》显得悲痛、低沉，以汪文宣妻子曾树生的出走，试图来指示人们改变自身生存环境；《巴山夜雨》则显得庄谐有致，力图烛照出国民性格的劣根性。无论如何，这两部小说通过战争与人性关系的形象揭示，倾注了作者和小说中人物对外敌入侵，生存环境恶化的愤怒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抗战精神的认同与参与意识。

二、良知与人物性格的扭曲——人物性格的两面刻画

作为上个世纪三、四年代抗日战争的经历者，巴金、张恨水对这次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与反省，我们透过《寒夜》《巴山夜雨》所塑造的人物，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窥见一斑。

作为《寒夜》《巴山夜雨》的主人公，汪文宣、李南泉均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是人物性格中的美好良知；另一方面是人物性格的扭曲与矛盾。

汪文宣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品性的忠厚，传统道德的教育，读书人清高的气质，使他在艰难的战争生活面前，能够保持廉洁，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对黑暗的专制社会充满了痛恨之情，在为书局周主任祝寿的宴会上，他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作呕。这个环境对他太不适宜了”，“他趁着众人吵闹地纠缠在一起似乎准备游艺节目时，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由此可见汪文宣是一个鄙视世俗、洁身自好的人。小说的另一段描写也对汪文宣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面前摊开的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大著的校样。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着。作者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年来怎样在进步在改革……‘谎话！谎话！’他不断在心里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汪文宣对社会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对战争，他有着发自内心的憎恨。他还有善良无私的美好品质。他对曾树生的爱是诚挚的，小说一开头，曾树生离家出走，他为寻找妻子，承受着巨大的心灵痛苦，却从没有埋怨过妻子一句，后来曾树生耐不住生活的折磨，再次离家出走，他仍然原谅了她。他对朋友也热情诚挚，他两次在酒店里碰见唐柏青都是处在心绪极端痛苦的境地之中，但两次他都先安慰朋友，希望鼓起对方生活的勇气。

巴金之所以在汪文宣身上集中如此众多的优点，意在说明这个被人们瞧不起、被社会抛弃的“卑贱”的人，从“上流社会”观点看来是渺小、低下的人，精神上却是当时社会优秀的人，他比那些达官显贵、那些发国难财的“主任”“经理”之流，在人格上不知要高得多。

与此同时，汪文宣又是一个性格扭曲的人。他在社会的重压下并不是奋起与命运抗争，而是一味忍让退却，他有改造生活的愿望却做不出改造生活的行动。给周主任做寿，他从心里反感，可是，他不能有所表示，而且在祝寿名单上违心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他对那种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大著”，深恶痛绝，可是他不敢仗义执言，明知是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却“不得不小心看下去改正误植的字”。当生活里出现波折时，他束手无策只能是借酒浇愁摧残自己，他谨小慎微，缺乏反抗精神。“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把这句话作为自己懦弱无能的辩解词。他整日徘徊在“小人物”的精神世界里，忧心忡忡，优柔寡断，认识上模糊，使他永远看不清母亲和曾树生身上那些本质性的思想弱点，因而也就无法解决家庭中无止无休的纠纷，他是一个屈从陈旧社会思想的懦弱者，又是一个企图把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调和起来的时代落伍者。

李南泉是《巴山夜雨》精心刻画的性格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穷困潦倒，却蔑视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拒绝富商送来的“车马费”，同时又为了一百五十元钱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寿星写“寿序”；他厌恶为虎作伥的刘副官之流，但又为黄副官的自尽而感喟人生的短暂；他自视是一个抗战文人，又自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坚主抗战，相信胜利终将到来，却又无可奈何的冷眼旁观着“村民们”的“桃色新闻”。这种性格，正如小说里奚太太评价的那样：“说你名士派很重，可又头巾气很重；说你头巾气很重，可是你好象又有几分革命性。”正是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可信的性格，“在战争的铸炼中，他的思想也得到一次难得的锻造，随着战争的深入，他也逐步清醒，在沉思中反省，预感到社会要有一次大的改革。”（9）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正是汪文宣、李南泉性格的两面性，才分别形成了二人生命轨迹的不同结局——汪文宣走向了死亡的悲剧，没有最终享受到抗战胜利的好处，只是留下了最后一句完整的话：“我可以瞑目死去。”而李南泉在小说的结尾，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发出了大声的疾呼：“天怒了，也许恼怒着日本人的侵略与屠杀。也许恼怒着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人。往小地方说，也许恼怒着我们这村子里先生太太们的嚣张之气。要不然，这雷怎么老是在这附近响着呢？爆炸吧，把……”（10） 这简直可以看成李南泉在战争的烈火中逐渐熔铸成了熠熠生辉的“精钢”了。简直是不约而同地展示了战时陪都重庆下层知识分子人生画卷。其言其行，相得益彰，令人深思。

结 论

综上所述，《寒夜》《巴山夜雨》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之所以如此相似，具有可比点，原因不仅在于小说创作背景的相似，而且在于两位作家具有相同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巴金和张恨水均采取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中的典型化方法，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加工，把当时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生活现象集中反映出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在生活真实基础上的艺术概括。

因此，作为巴金抗战后期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另两篇分别为《憩园》《第四病室》）之一的《寒夜》，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巴金的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对社会生活进行的是细致的刻划，激情渗透在客观的描写之中，显得含蓄、深沉，极具悲剧震撼力。而张恨水的《巴山夜雨》向读者展现的一幅抗战时期重庆山村众生图，通过对故事人物平凡生活的历历描绘，在亲切感人、自然隽永之中进行了历史反思和民族自省，使得这部小说具备了历史厚重感，可以看成是张恨水对章回小说创作内容和创作形式的新探索、新尝试。

注 释：

（1）尤冬克：《“生存意识”与抗战文学——谈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北方论丛》，1998年第4期。

（2）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新清华文丛之三）》，第10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巴金：《寒夜》，第286、285、181-182、19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2月第2版

（4）巴金：《寒夜》，第286、285、181-182、19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2月第2版

（5）张恨水：《巴山夜雨》，第1、245、820页，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6）巴金：《寒夜》，第286、285、181-182、19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2月第2版

（7）巴金：《寒夜》，第286、285、181-182、19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2月第2版

（8）张恨水：《巴山夜雨》，第1、245、820页，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9）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第31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0）张恨水：《巴山夜雨》，第1、245、820页，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作者简介：谢家顺，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宣传部副部长。**